

## 西夏陵碑亭考古

□余 军

---

摘要：本文介绍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考古发掘西夏陵区中 5 座帝陵的 9 处碑亭遗址、两座陪葬墓的 3 处碑亭遗址的清理情况，就这 12 处碑亭遗址出土残碑块的碑铭内容、碑亭建筑、石碑形制等三方面的研究现状作了概述。

关键词：西夏陵；碑亭；发掘；研究

作者简介：余 军（1967 -），男，宁夏银川人，宁夏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西夏学。

---

西夏陵区陵墓前的碑亭是西夏陵寝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夏陵区碑亭遗址的清理发掘，对西夏历史研究、西夏文字搜集整理、西夏陵区帝王陵园和陪葬墓的陵墓主人身份的认定及西夏建筑的研究等都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兹将近 30 年来的西夏碑亭遗址考古研究情况略作回顾。

### 一、西夏陵区碑亭遗址发掘

西夏陵区碑亭建筑与墓葬的等级有密切关系，帝陵一般都有 2 ~ 3 座碑亭。西夏陵区 9 座帝陵现存碑亭遗址共 16 处，其中 1 号、2 号陵各 3 座，3 号陵 2 座，4 号陵现只存 1 座西碑亭（东碑亭可能在早先某单位基建施工时被破坏），5 号陵 3 座，6 号陵 2 座，7 号陵 2 座。8 号、9 号陵除陵塔外，所有地面建筑均被夷平，故碑亭已不存。按照西夏陵区其他帝陵的陵园建筑规制、布局，估计这两座陵原来至少各有 2 座碑亭。9 号陵西碑亭，20 世纪 70 年代某单位基建时，曾出土了四件雕像石碑座（后文详述）。西夏陵区的陪葬墓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类，小型墓一般没有碑亭，部分中型墓和多数大型墓有一座碑亭，少数大型墓有两座碑亭建筑。有碑亭的陪葬墓约占其总数的近三分之一。碑亭建筑的规模与墓葬的规模成正比。西夏陵区所有碑亭建筑遗址的现状均成土丘状，土丘上及周围散布碎砖和砂岩残块等，偶见带文字的残碑碎片。对于西夏陵区的碑亭建筑遗址，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先后进行过 8 次发掘，共清理碑亭遗址 12 座，其中帝陵碑亭遗址 9 座（分别为 9 号

陵西碑亭，7号陵东、西碑亭，6号陵东、西碑亭，5号陵东、西碑亭，3号陵东、西碑亭），陪葬墓的碑亭遗址3座（即原编M108号陪葬墓碑亭1座、原编M101号陪葬墓碑亭2座）。各碑亭遗址发掘情况简介如下。

### 1. 6号陵（原编8号陵）碑亭遗址的发掘

6号陵位于三区西北部。陵园紧依山脚，西、北两面环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茕域面积10万平方米。陵园有外城结构。碑亭两座，在陵园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排列，间距约60米、南距鹊台46米、北距月城南墙约37米。1972年起，宁夏博物馆对6号陵的墓室和部分地面建筑进行了发掘，其中包括对该陵东、西两座碑亭的清理。

东碑亭夯土台基呈方形，台基底边长22米、宽21米、高2.4米，台面长19米、宽18米。台基四面用条砖砌成五级逐渐收缩的台阶。台面上残留一圆形建筑基址，基址地面以方砖平铺。台基西面正中有一斜坡式踏步，踏步长9.5米、宽7米。在东碑亭发现西夏文残碑300多块、汉文残碑320多块，雕像石碑座1件以及货币等。另外还出土了大量砖块，不见瓦和瓦当。清理时砖和残碑表面均为黑色，是否原色，或因后人墨拓、或焚烧所致，色迹未作过化验。

西碑亭方形夯土台基，规模小于东碑亭。台基直壁，四周以条砖包砌，包砖与台基夯土间以碎砖填充。台基长16米、宽15米、高0.9米，台面上有铺地方砖、柱础石遗迹，柱础石用的是自然扁平石块。台基东西两面正中各有一斜坡式踏步，宽约3.9米，用条砖立向铺砌。西碑亭台基上发现西夏文残碑约400块。出土建筑材料有砖、瓦、鸱吻等。<sup>[1][2]31</sup>

### 2. 7号陵（原编2号陵）碑亭遗址的清理

7号陵在四区中部，陵园地面建筑大多已不复存在。陵城东面为一片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多排平房。从陵园残存的部分建筑观察，其有封闭式外城。茕域复原面积约8万平方米左右。碑亭两座，东西间距约70米、南距鹊台50米。1975年9月对该陵的两座碑亭进行了清理。发掘后的建筑遗迹状况没有资料公布（据说当时注重的是残碑的搜罗）。在《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一书中有数语“东碑亭南面二分之一被推土机推掉。西碑亭夯土台基保存尚好。台基方形，边长16米、高2米。”西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1265块；东碑亭出土汉文残碑510块。<sup>[2]38、121、127[3]</sup>

### 3. 5号陵（原编10号陵）碑亭遗址的发掘

5号陵位于三区北面中部，北距7号陵约3公里。地势北高南低。陵园陵城东、西、北三门外附有瓮城式的外城。茕域面积10万平方米。碑亭共有3座，两大一小。两座大碑亭于陵园中轴线东西对称排列，间距60米、南距鹊台约50米、北距月城南墙近30米。小碑亭在东鹊台与东碑亭之间，南距东鹊台30余米、北距东碑亭9米。小碑亭夯土台基边长约7米，略高出地面，台基上及周围布满瓦砾。1977年秋，宁夏博物馆发掘了两座大碑亭。这两座碑亭夯土台基均呈方形，边长15米、高1米。两座碑亭相对的一面正中各有一踏步，踏步宽3米，条砖立砌围边，中间以条砖平铺，约分为5级。碑亭台基以条砖包砌，台基台面上四面距边缘约1米处，发现围墙遗迹，其以单砖错缝平砌，残存部分最高有三层砖。围墙内以素面方砖铺地。铺地砖四角各有一柱洞，距围墙约1米。柱洞直径0.3米，底部以自然片石作柱础，石柱础上原有立柱，残留柱子的根部已成木炭。碑亭出土物多为建筑材料，主要有条砖、方砖、板瓦、筒瓦、滴水、瓦当等，还有许多形制难辨的琉璃装

饰构件。出土碑块都比较破碎，西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63 块，东碑亭发现汉文残碑 26 块。<sup>[2]27-28</sup>

#### 4. 3 号陵（原编 13 号陵）碑亭遗址的发掘

3 号陵位于二区东北部，南距 1 号陵和 2 号陵 3.5 公里，北距 5 号陵 2.3 公里。周围地势开阔平坦，茕域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碑亭两座，处陵园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间距约 80 米，南距鹊台 34 米、北距月城南墙 37 米。3 号陵碑亭台基高大，显得十分突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陵两座碑亭都进行过发掘。

1987 年 8 月至 10 月清理了东碑亭遗址。东碑亭夯土台基呈方形，分五级（从东碑亭发掘简报发表的遗址平面图看，似为三级）向上收进，周壁原由粗绳纹条砖单砖交错包砌，黄泥勾缝，包砖与台基夯土之间的空隙用碎砖黄土填实。台基底边长 21.5 米、高 2.25 米，清理后的台面呈抹角方形，见方 15.5 米。台面中间是一圆形建筑基址，由亭室和“回廊”（发掘者当时的认识）组成，基址高出夯土台面约 5 厘米（一砖厚）。亭室内径 7.5 米，“回廊”宽 2.5 米。亭室南向辟门，门宽 2.25 米。亭室中央从东而西一字排列四个人像石座，现存三毁一。亭室地面铺方砖，也有大方砖，人像石座前对着门的中心部位铺有莲花纹方砖 25 块。“回廊”部铺砌条砖，垒砌最高残留有四层砖，砖内侧壁附有白灰墙皮。白灰墙皮有两层，里层厚 0.4 厘米~0.8 厘米，外层厚 0.1 厘米~0.15 厘米。两层白灰墙皮皆光洁平整，外层白灰墙皮应是维修时二次抹上的。“回廊”外部台基面又铺方砖。台基南面有黄土夯筑的斜坡式踏步，平面略呈扇形，坡度 10°，前宽 10 米、后宽 9.5 米、纵长 10.5 米。遗址毁塌堆积物厚 0.45 米~0.8 米，出土物为大量砖类建筑材料。砖分素面方砖、条砖、绳纹砖、刻划纹砖、花纹砖、特型砖，还有一些石刻残件、铜器、钱币、铁器、陶瓷器等。板瓦、筒瓦、瓦当、滴水数量很少，还有部分琉璃饰件，这些被认为是从附近其他废墟中移来的。出土西夏文碑铭残块 360 余块，碑块碎甚，存字极少，残块存字最多 3 个字。<sup>[4]</sup>

1998 年 8 月至 10 月清理了西碑亭遗址。西碑亭建筑遗迹现象、形制多与东碑亭相类同。遗址亦由方形夯土台基、台基台面上圆形基址、斜坡式踏步三部分构成。台基底边长 20.5 米、高 2.2 米，大体分三级向上收进。清理后的台基面呈抹角方形，见方 17 米左右。台基周壁有包砖残迹及填塞包砖与台基夯土壁之间空隙的碎砖黄土。台基南面斜坡式踏步坡度为 15°，面宽 4.7 米~5.2 米、坡面纵长 12.4 米。台基台面中部的圆形基址，残存迹象为，因铺地砖形制、摆砖方式不同而形成的由大小两个同心圆组成的环形建筑基址轮廓。内圆（亭室）直径 7.6 米，外圆直径 13.6 米，内圆与外圆之间的环形地面宽 3 米。内圆中间自东而西一字排列四个雕像石座，现剩三个。基址面残留铺地砖，内圆基面主要以素面方砖东西向错缝平铺；内圆与外圆之间的环形地面铺砌素面条砖及扁梯形和长梯形砖，砌砖最高残存三层砖；外圆外侧之夯土台基面铺素面方砖。内圆南向开口辟门，开口面宽 2.15 米，存有方砖铺地延至外圆缘边，向南正对踏步。在环形基址内外的摆地砖下发现两组共 46 个柱洞：一组分布于环形基址外圆外缘一周，有柱洞 27 个；一组分布在内圆中，有柱洞 19 个。柱洞平面有圆形、椭圆形、似方形、“8”字形、“品”字形、方圆结合形几种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口径 0.14 米~0.18 米、深 0.13 米~0.79 米，平底居多，部分柱洞的排置有一定规律。遗址出土建筑材料以各种形制的砖为主，也有少部分瓦类和琉璃饰件。其他遗物有石刻残品、铜器、钱币、铁器、陶瓷器等。出土西夏文碑刻残件 700 多块，

残碑字体多残留明显镏金痕迹，残碑块有字最多者 20 个字，存整字 3 至 8 个的残碑块占一定比例。<sup>[5]306-307</sup> 已发掘的其他帝陵碑亭遗址出土残碑是汉文、西夏文并存，而 3 号陵东、西碑亭出土碑铭残块皆西夏文，无汉字碑块，这是其较为显著的一个特点。

#### 5. 原编 M108 号陪葬墓碑亭遗址的发掘

该墓位于四区西南部，独处山脚下，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距 6 号陵约 1 700 米，东北距 7 号陵约 700 米。墓园由一座碑亭、墓城、墓冢组成。墓园的西北面还有一道筑石坝的遗迹。墓城夯土墙宽约 1 米，南北长 58 米、东西宽 55.6 米、残高仅 0.2 米，内外均涂有两层白色石灰墙皮。南墙中部有一宽 3.25 米的门道，从此处地面发现的部分砖瓦推断，初建时可能设有门楼。墓冢、墓道在墓城内子午线以西。墓冢现为一残高 4.5 米、直径 5.6 米的不规则圆形椎体，下部亦发现有两层白色石灰皮，说明墓冢原来全部涂抹成白色，若干年后又曾进行过二次粉饰。墓道在墓冢之南，填土隆起成鱼脊状，方向 160°。墓城南墙外靠东一侧距墙约 40 米处，有一座碑亭。1975 年秋冬，宁夏博物馆发掘了该墓墓室和碑亭遗址，调查了墓园地上建筑遗迹。碑亭台基呈方形，边长 10 米，高出地表约 0.8 米，基面残留有铺地方砖。在碑亭残基上，收集到有字残碑 349 块，其中刻汉文的有 216 块，刻西夏文的 133 块，每块少则一两字，最多有 380 余字。两种文字的碑文内容基本一致。<sup>[6]</sup>

#### 6. 原编 M101 号陪葬墓碑亭遗址的发掘

该墓位于三区中部北面，西距 5 号陵约 300 米。墓园由外城、碑亭、月城、墓城、门楼、照壁、墓道、墓冢组成，是陵区最大的陪葬墓之一，茕域面积近 2 万平方米。1977 年 2 月至 11 月，宁夏博物馆派吴峰云、李范文、杜玉冰三位同志对此墓进行了发掘清理。碑亭两座，在墓园的最南面，东西对称，间隔 43 米，北距月城南墙 8 米。

东碑亭夯土台基呈方形，底边长 10.5 米、高 0.96 米。台基周壁以长条砖包砌。台基台面中部用方形砖铺地。在铺地砖的中心有一长方形方框遗迹，方框东西长 2 米、南北宽 1.54 米。台基东、北两面边缘各存两块扁平柱础石，东面的两块间距 4 米，其南侧一块距台基南边 1.1 米，北侧一块距台基北边 3.3 米；北面的两块间距 2.6 米，各距台基东边、西边皆约 2.8 米。台基的西侧正中有一宽 1.7 米、长 1.43 米的斜坡踏步。遗址近旁出土少量长方形绳纹砖，有纹饰一面的正中凹成方槽形，中有一干支字。

西碑亭夯土台基也呈方形，底边长亦 10.5 米、高 0.78 米。台基周壁无砖包痕迹。台基台面上也未发现铺地砖。但在台基面的四边残留有土坯石灰墙或墙基，围墙平面呈正方形，边长 8.2 米。每堵墙的内外两边各有两块扁平自然石块作柱础。南、北两面，围墙内外各两块础石间距均为 2.4 米，每块础石分距台基面东、西侧边 3 米。东、西两面，围墙内外的础石的位置曾被移动。台基东侧正中为一斜坡砖砌踏步，长 1.3 米、宽 1.53 米。西碑亭遗址的周围有大量残砖碎瓦。

两座碑亭遗址的台基形制和面积基本相同，原发掘者认为，它们“上部的建筑形式却有明显差异。西碑亭可能是一座殿宇式建筑，而东碑亭则可能是一座亭台式建筑”。在两座碑亭遗址的台基上，出土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文字的残碑块 101 块，其中最大块有 40 余字，最小块上仅存半字。<sup>[2]72-73[7]</sup>

#### 7. 9 号陵（原编 1 号陵）西碑亭遗址的发掘

西夏陵区的考古发掘工作也许就肇始于 9 号陵西碑亭遗址的清理，但这个碑亭的基本情况一直以来湮没无闻。已出版的有关西夏陵考古报告、西夏历史文物概述图录，乃至发

表的一些宁夏文物考古方面的阶段性、综述性或纪实性的成果、文章均未提及。缘于西夏陵考古时段的历史局限性，早先西夏陵区某些遗址的发掘、调查材料以现在的要求来衡量略显得单薄，甚至有的发掘资料遗失而没有留下遗址文字记录和相关比例图。而存留的9号陵西碑亭遗址的基址平面比例图及其几幅黑白照片，提供了久所未知的9号陵西碑亭遗址建筑基址及4件雕像石座出土时的基本情况。

碑亭夯土台基方形，台基上建筑塌毁物堆积厚0.8米~1米。台基底边长22.3米、台面边长约19米、高2.2米余。台基四壁是阶梯式向上收进还是斜坡状，可能没有专作清理，图纸上未见明示。台基台面残留迹象为由大小两个同心圆构成的环形基址，内圆（亭室空间）直径6.8米，外圆直径9.2米左右，环宽2.2米~2.5米。内圆中的基面铺素面方砖和长方形砖；环形基面砌筑长方形条砖，残存砌砖最高有6层砖；环形基址外圆外的台基台面铺素面方砖和长方形砖。基面墁地砖多已不存。环形基面的砌砖遗迹表明它是起分割碑亭亭室空间与外部空间的墙体作用，砖墙基部内外侧壁面残留抹黄泥和黏附在黄泥上的白灰墙皮遗迹，黄泥层厚0.5厘米~0.8厘米，墙内壁白灰皮层厚1厘米~1.6厘米~2厘米不等，墙外壁白灰皮层厚2厘米左右。墙基外壁距台基台面四边3.7米~4.2米。按基址平面图及剖面图中标示的方向，9号陵西碑亭亭室面朝东，东向辟门，在环形基址东部中间单独有一片铺素面方砖的遗迹，铺墁的方砖范围东西长约2.8米、南北宽1.9米，这应是进入亭室的露道部分。夯土台基东侧面的踏步部分可能没有发掘清理。

亭室中间南北轴线上列置四件方体雕像石座，石座朝向东面，雕像的面孔面对亭室入口。自北向南数，第一件石座面宽61厘米~62厘米，顶面后侧残，顶面中心一方形榫孔，孔径8.5厘米、深10厘米；第二件石座面宽亦61厘米~62厘米，顶面中心一方形榫孔，孔径9厘米、深6.5厘米；第三件石座仰面倾倒，所在原位置被向后（西）有所挪动，面宽59厘米左右，顶面亦有榫孔；第四件石座面宽60厘米~61厘米，顶面后侧残，顶面中心一方形榫孔扭转一定角度，即其四边的相对两边与石座顶面四角部的两条对角线大体平行，孔径8厘米、深6.05厘米。各雕像石座之间相邻位置：第一件石座北侧面北距亭室内壁66厘米~73厘米，第二件石座与第一件石座南北相对的侧面间距97厘米，第三件石座与第二件石座南北相对的侧面间距约110厘米，第四件石座与第三件石座南北相对的侧面间距约90厘米，第四件石座南侧面南距亭室内壁72厘米，第四件石座相对第一件和第二件石座向东错前14厘米。雕像石座除第三件外，位置未动的其他三件均出露于亭室铺地砖地面以上29厘米左右，即雕像石座上半部的人面头像暴露，石座下半部沉入亭室铺地砖地面以下。

9号陵西碑亭遗址出土的其他遗物除砖块外有（照录遗物清单）：黑色西夏文碑碎片（按：可能指经过墨拓的碑块）103块；小字西夏文碑残片36块；大字西夏文碑碎片5块；汉文碑碎片2块；碑边花纹残块21块；石刻龙头2个；琉璃砖瓦残片29块；灰陶瓦残片9块；瓷片3块“陶柱”2块；铁钉13个；小铜器1件“景德元宝”1枚；石灰皮和朽木1小盒；灰烬1包；兽骨8块；小块兽骨1盒；火烧骨头1小盒。

9号陵西碑亭建筑基址的规模、形制与3号陵东、西两座碑亭及6号陵东碑亭均基本一致，基址亭室中间轴线上所置放的雕像石座也都是仅露出石座上半部头像，下半部肢体埋在亭室铺地砖地面以下（3号陵东、西两座碑亭亭室中挖有放置雕像石座的座坑；6号陵东碑亭出土的一件雕像石座是否也是埋入下半部，原发掘简报中其发现情况未见介绍）。西夏

人何以将雕凿完整的跪姿负重人物形象的碑座在碑亭放置时只让它们露出面部，这一现象颇令人费解。关于碑亭的亭室入口方向，5号陵、6号陵及原编M101号陪葬墓，这三处陵墓东、西两座碑亭的入口都是东西相向，门对门，即东碑亭亭室西面辟门，西碑亭亭室东面辟门（6号陵西碑亭台基东西两面正中各有一斜坡式踏步，可能东西两面均辟门）。若此，9号陵西碑亭亭室是东向辟门，其原来存在的东碑亭亭室应在西面辟门，两座碑亭的入口也应该是东西相向。现确知唯有3号陵东、西两座碑亭的入口都是面南向，即由南向北进入亭室。

#### 8. 其他碑亭遗址的发掘

2000年及2001年，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发掘了位于西夏陵区南约23公里闽宁村西夏墓地的四座碑亭遗址。四座碑亭遗址均残剩方形夯土台基，一座台基见方5.5米，一座台基见方8.5米左右，另两座台基见方6.2米~6.5米，四座台基残高0.25米~0.7米不等。台基周壁有白灰泥皮残迹。台基台面上有柱洞及墙体遗迹。台基东侧有斜坡踏步。出土遗物多为板瓦、筒瓦、瓦当等。所见残碑皆汉文碑块。<sup>[8]79-140</sup>

## 二、西夏陵区碑亭遗址研究

经过对西夏陵区上述12座碑亭遗址的发掘，获得了一大批十分宝贵的资料。在碑文内容方面，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墓碑形制、碑亭建筑等问题上也有一些新的认识。

### （一）关于碑文内容

12座碑亭遗址出土残碑共计4400多块（含带碑缘花纹残块），其中的西夏文碑铭3300余块，汉字碑铭1100多块。由于西夏陵屡遭浩劫，所得残碑多较为破碎，一残碑块上仅存1字~5字的占多数，尚有10字~20字的不足总数的五分之一。碑块拼对最多有字381个，碎小碑块有字最少的只存一笔半画。通过缀合译识和考证获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收获。

#### 1. 7号陵（原编2号陵）陵主的确定

7号陵两座碑亭出土残碑块数量最多。在这些残碑中有一面由19块碑文残块拼合而成的西夏文篆体碑额，译为“大白上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大白上国”是西夏的国号。“护城圣德至懿皇帝”为西夏仁宗李仁孝的谥号。“寿陵”是李仁孝的陵号。这为断定7号陵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圣德皇帝李仁孝的寿陵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sup>[2]121-122[3][9]3-5</sup>7号陵是目前为止唯一能确知陵主的西夏帝陵。

#### 2. 原编108号陪葬墓墓主人身份的确定

该墓一座碑亭所出残碑的内容比较丰富。根据出土的汉文和西夏文残碑碑题均有“梁国正献王之神道碑”句，确认此陪葬墓是西夏梁国正献王之墓。经对夏、汉两种文字碑块缀合译释，知墓主人为“尚父、太师、尚书令、知枢密院事、六部[监门]、梁国正献王嵬名讳安惠”。“尚父、太师、尚书令”均为虚衔。“知枢密院事”为执掌军事大权的枢密院首席长官，官居二品。“梁国正献王”是西夏贵族世袭的爵位。“嵬名”是西夏皇姓。“安惠”，史书缺载，其生年不详，卒年据汉文残碑中“尤老至正德三（年）/谥曰忠毅公”句可知在正德三年。按上海自然博物馆所作的死者人骨鉴定，墓主人是年龄在50岁至60岁的男性。若墓主人卒年60岁，其有生之年当在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至崇宗正德三年（1069~1129）；又从全部残碑中的叙事内容分析，正献王的出生年代当在“拱化初”以

后, 其在世大约在公元 1063 ~ 1129 年这 60 余年间。这些与碑文中经常出现的“毅惠两朝”、“崇宗践位”、“天安礼定二年 (1086)”等时间相符。“毅惠两朝”至“崇宗践位”初期, 在西夏历史上正是外戚梁氏集团摄政专权的时期, 碑文记载的反映墓主人生前活动的一些事情, 如随梁太后征怀德军、维修兴庆府等, 也正是嵬名安惠得势之时。碑文中还有“协熊罴之力”、“公为齐斧”、“宰辅国宁”、“世纷横流砥柱中立”、“速驰传入朝”、“公进谏曰”、“上嘉纳之”、“谋行计施”等文句, 这些碑文都说明了嵬名安惠曾是一个出入于朝廷内外、听命于皇帝左右、得宠于一时的权臣。在出土的汉文碑中有句“家声振兴/光定五年”, 西夏文残碑中亦有“光定五年”句。李范文先生考证认为, 此“光定五年 (1215)”是为嵬名安惠树碑立传的时间, 安惠死时失宠未树碑, 80 多年后即光定五年, 神宗遵项执政时才得以使安惠家族“家声振兴”, 并为他树碑立传。<sup>[2]131、136、138-139[6][9]9-11</sup>

### 3. 6 号陵 (原编 8 号陵) 陵主问题的讨论

6 号陵发掘简报的作者认为该陵应是西夏第八代皇帝李遵项的墓葬, 给出理由四条: (1) 东碑亭出土汉文残碑中一块上面有“齐王以孺慕”五字, 李遵项曾为“齐王”, 这条碑文可说明陵主可能就是李遵项。(2) 有一块汉文残碑上有“降虞舜”三字, 可能借虞舜来比喻李遵项的圣明, 或者借虞舜禅位的故事歌颂宋嘉定十六年 (1223) (西夏乾定元年) 遵项自号上皇, 传位于其子事情。(3) 陵台前西侧土堆中出土一枚“光定元宝”钱, 是遵项时所铸。(4) 6 号陵的右前方 300 多米处有一座属于 6 号陵的陪葬墓, 在清理这个墓的西碑亭遗址时, 出土的汉文残碑中有“破会州”三字, 而西夏只有在金兴定四年 (1220) 八月, 也就是遵项在位时期, 才攻陷过一次会州。这座陪葬墓的主人既然和攻会州有关, 又是作为 6 号陵的陪葬墓, 所以“破会州”的碑文为判定 6 号陵墓主的年代又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证据。<sup>[1][9]5-7</sup> 韩兆民、李志清撰长文对西夏 6 号陵陵墓主人是遵项提出异议。首先, 认为“降虞舜”是一个历代封建帝王普遍使用的颂词, 大凡历代封建帝王之墓志碑文等无一不用“天子”、“降虞舜”之类来比喻自己的圣明, 为其歌功颂德, 并非专指某一个人; 其次, 关于陪葬墓出土的汉文残碑“破会州”三字的问题, 暂且不论这个墓是否为 6 号陵的陪葬墓, 又引用诸方面史料说明此“破会州”不是遵项时期陷金之会州, 而应是西夏早期破宋之会州的记述; 再次, 认为“光定元定”铜钱是在早年掘墓者挖出的扰土中发现, 仅属孤证; 最后, 认为“齐王以孺慕”中的“齐王”封爵也不只限于遵项父子, 始封者是谁, 史书中没有记载, 但不能因此而误断为除了遵项父子之外别无他人, 同时针对这块载有“齐王”称号的汉文残碑共有三行断断续续的文字内容进行分析, 6 号陵是遵项墓葬的结论不能成立。文章又从该墓其他汉文碑块中出现的“淳化”、“太宗”、“三蕃枢 [密使]”、“食邑三”、“[皇] 太后”、“当韶此之年”等词句, 经解析认为 6 号陵是西夏早期墓葬而不是晚期的墓葬; 又通过有关史料分析认为西夏陵区内根本就没有遵项的墓葬; 从西夏陵区各陵墓的择穴方式 (昭穆葬) 结合 6 号陵出土的其他货币、6 号陵陵园地面主要建筑物曾进行过几次维修、墓葬甬道壁画先后两次重绘等考古资料, 且进一步指出 6 号陵的墓主人是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李乾顺。<sup>[10]316-326</sup>

### 4. 3 号陵 (原编 13 号陵) 陵主的推测

该陵东、西碑亭的西夏文碑铭残块尚无系统、全面地整理研究。有以西碑亭的西夏文碑铭残块上“契 [丹]”、“杀其吐蕃”、“羌汉番三/天子所为/仲曾祖/皇帝昔”、“祖父”、“天子/祖婚姻/契丹”等语句, 认为反映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影射追述有西夏 (陵主所处时

期)与吐蕃、契丹(辽)、宋之间的关系、战事。西夏对外同时涉足于与吐蕃、与辽、与宋之间的关系,时间上在西夏前期。二是隐射追忆有西夏(陵主先祖)与契丹(辽)的联姻、和亲状况。西夏娶辽国公主3次,分别为:统和七年(989),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景福元年(1031),兴平公主嫁与元昊。乾统五年(1105),成安公主嫁与乾顺。由此大体推断,3号陵为西夏前期的帝王陵。又参征西夏崇宗乾顺以前专重夏字、夏学等史实,认为3号陵是西夏继迁、德明以后,崇宗乾顺之前的帝王陵,不排除是元昊陵的可能性。<sup>[11]</sup>

#### 5. 原编101号陪葬墓墓主人的推断

原发掘简报从该墓碑亭出土的汉文残碑有“天盛二年庚午秋”、“都大勾[当]”、“兼知枢[密院事]”及西夏文残碑有“庚戌四年”、“中书令”等词句,分析认为墓主人是一位身份非常显贵的贵族,墓葬的年代在仁宗天盛二年(1150)至乾祐二十四年(1193)。<sup>[7]</sup>后有以该墓西碑亭汉文碑“嬉戏宛有成人之风”一语、“树联裾”、“闺门”字词及东碑亭汉文碑中的“仁爱”、“千秋”、“太子”、“都大勾[当]”等内容分析,疑此墓主人为仁孝弟仁友。<sup>[9]8-9</sup>

#### 6. 其他内容研究

西夏陵区碑亭遗址出土的残碑铭文中还有许多人名、地名、职官、民族、纪年等,人物如“风角城皇帝”、“明城皇帝”、“白城皇帝”、“永平皇帝”、“皇太后梁氏”、“太后罗氏”、“梁乞逋”、“梁元辅”、“夜(野)利仁荣”、“成安公主”、“乞勒”、“郭成”、“皇太子绍隆”等;民族如“吐蕃”、“契丹”、“匈奴”、“鞑靼”等;官职如“太师”、“尚书令”、“知枢密院事”、“六部监门”、“梁国正献王”、“驸马都尉”、“都尉”、“朝议大夫”、“金紫光禄大夫”、“太尉”、“翰林”、“丞相”、“僕射”、“柱国”、“中书令”、“经略使”、“宣徽使”、“御史”、“都大勾当”、“文武大学士”等;地名如“大白上国”、“中兴府”、“银州”、“宥州”、“灵州”、“藏财山”、“怀德军”、“定远”、“五原郡”、“贺兰山”、“东南谷”等;纪年如“甲午五年”、“丙午十七年”、“乙酉十七年”、“大庆辛酉二年”、“癸巳十五年”、“五年乙亥”、“天安礼定二年”。这些内容的考证都丰富了对西夏历史的认识,有些起到了补史、正史的作用。<sup>[9]12-36</sup>另外,贾敬颜先生所藏一册西夏陵园残碑拓片,“尽管字数少,难以连缀成句,但也反映了多方面的内容,值得重视”。这批拓片中有西夏的职官名称,如“……孝敬敬东……”、“皇后”、“驸马”、“执笔僧监”及“天子”;地名中有“古罗城”;民族名有“番”字;有时间记载;有亲属称谓,如“侄”、“子孙”;有政治术语“上疏”、“敕”、“治国”等。总之,这批拓片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仍然提供了多方面的资料。<sup>[2]155-162</sup>

#### (二) 关于碑亭建筑

有关已发掘的西夏陵区12座碑亭遗址的建筑形制研究相对薄弱,一方面囿于公布的碑亭建筑基址的遗迹现象描述过于简略,大多数清理过的碑亭基址甚至没有留下建筑基址平面剖面比例图。如杜玉冰先生曾告诉笔者,她的5号陵碑亭遗址考古发掘材料遗失在考古所原西夏陵工作站;又有报道说西夏陵1号陵两座碑亭遗址经过清理,但何年、何人所为,没有说明,亦未见资料公布。<sup>[12]13、58</sup>另一方面还在于发掘清理者忽视碑亭建筑的内容,涉及这一问题往往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仅在个人理解和想象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判断。当然,根本因素还是古建筑知识的贫乏,当时西夏考古工作者关注的着眼点有所偏差,至少对碑



亭研究的视野是不全面的。而西夏陵考古历史阶段性与西夏碑亭基址自身残损过甚的局限及西夏民族建筑图文资料的匮乏，都阻碍了对这方面问题的探讨。

已有的认识是，西夏碑亭建筑建在夯土台基之上，夯土台基都是方形，台基有直壁或向上逐级收分之别，周壁一般有包砖；台基上碑亭建筑形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为方形建筑，一种是圆形建筑。

属方形建筑的有5号陵东、西碑亭，6号陵西碑亭，原编M101号陪葬墓东、西碑亭。这些碑亭建筑遗址的共有特点是：第一，建筑的台基方形直壁，规模较小，台基边长15米左右（原编M101号陪葬墓碑亭基址边长仅10.5米），台基高度不超过1米，四壁以条砖包砌。第二，台基上的墁砖遗迹轮廓呈方形，外围间或发现有条砖垒砌的围墙迹象。在5号陵碑亭台基台面的铺砖四角发现各有一柱洞，柱洞底有柱础石及被烧而炭化的立柱的根部；在原编M101号陪葬墓西碑亭台基台面上的四面围墙内外两侧还发现了分布规律的柱础石。第三，出土的建筑材料中均含有瓦类遗物，种类有板瓦、筒瓦、滴水、瓦当，有的并出土琉璃脊饰残片。这类方形碑亭，可能是种“构架制”的“梁柱式建筑”，四周立柱上施梁枋，牵制成为一“间”。梁架之上做屋顶，屋顶起脊覆瓦，并饰以琉璃装饰构件（当然陪葬墓碑亭可能不饰琉璃材料），似有中原传统的亭式建筑格调。

属圆形建筑的有3号陵东、西碑亭，6号陵东碑亭，9号陵西碑亭。这类建筑的特点有：第一，夯土台基呈方形，规模较大，台基边长20.5米~22米，台基较高，均在2米以上，特别是6号陵东碑亭夯土台基比方形建筑的西碑亭的夯土台基高出1.5米。第二，台基向上逐级收缩，其中3号陵东碑亭、6号陵东碑亭的夯土台基四面为五级台阶式，3号陵西碑亭的夯土台基四面为三级台阶式。第三，夯土台基台面上由铺地砖显示的遗迹呈圆形，且皆分内、中、外三部分。第四，遗址出土建筑材料是大量砖块，少有瓦类，即便是出土少量瓦类也被认为是自别处移来。遗迹现象中不见柱础；3号陵东、西碑亭虽然发现许多柱洞<sup>①</sup>，但似与建筑结构无关，因为柱洞都压在铺地砖下，有些柱洞处在石碑位置前，并有被同期的雕像碑座坑打破的现象。

在方形台基上建圆形建筑，“上圆下方”，应是附会中国“天圆地方”之说而设计。“天圆地方”并非仅指形状而言，它是由自然界的天地之形而引申出来的一种礼制思想。西夏陵这类圆形碑亭，可能全部以砖构筑。3号陵东碑亭发掘简报中指出，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卷首佛画，在其左下侧画有一座倒扣钟形的圆形建筑<sup>[4][13]图版394</sup>，可供比拟参考。这样的建筑，民族宗教色彩浓厚。以3号陵西碑亭遗址为例，在其夯土台基台面上，以砖墁砌的环形基址的内外侧铺地砖下清理有两组柱洞。分布在环形基址的外圆缘边的一组27个柱洞，排列较有规律，这一周柱洞大多紧临基址外圆外侧，柱洞间距一般为1米~2米，大小深浅有所差异；在环形基址内圆中的一组19个柱洞，从它们的分布情况观察，多无明显规律可寻，柱洞大小、深浅差异也较大，有大规格的柱洞分布在立碑位置前，有些被石碑座坑所打破；但较明显的有在内圆南向开口处，有两个柱洞左右对称，且形状大小与深度一致。环形基址外圆周缘的一组柱洞是便于构筑砖室结构过程中搭建“脚手架”，使其底部稳固。脚手架是临时性的，用完后要拆除，所用的木料还要继续使用，各节点采用麻绳或竹篾绑扎。环形基址内圆中的一组柱洞是专为构筑砖室顶部结构而搭建“拱券模架”服务，拱券模架是拱券在砌筑前，按照拱券的跨度和矢高，做好拱券模和支架，以便在架模上砌筑。券模下面的支架要承受很大的重量，特别是在拱券合拢以前，因此，

架模要牢固、稳定，受荷时不变形，还要便于拆除。环形基址内圆中分布的柱洞适应了设置架模需坚固、稳定的要求。疑惑之处主要在于，如果暂且把安放墓碑的地方视为内部空间，而在分割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位置上所发现的环形砖砌遗迹其环宽竟达3米，那么，这样的宽度不大可能是通常意义的墙体，也与西夏陵区其他地点发现的房屋墙体有异。不妨可作这样理解，碑亭亭室的圆形墙体基宽是3米，为保障亭室空间，圆形墙体内壁是直壁，外壁上部向上逐渐叠涩收进，越向上周壁渐薄，是为减轻砖砌亭室上部压力，至顶也便于拱券。整体外观呈高圆丘塔状。

### （三）关于墓碑形制

西夏当时的完整石刻碑铭，传世甚少，仅存两件。一通是藏武威博物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碑石立于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4）。碑圆首，早先的金石著述记有“连额高七尺七寸，广二尺八寸”，现今著作文章记为碑身高2.5米、宽0.90米、厚0.30米。两面刻文，一面刻西夏文，一面刻汉文。正面碑头西夏文篆字题名“敕感通塔之碑铭”，碑头题名两侧各有一身线刻伎乐菩萨，作舞蹈状，题名上端刻云头宝盖。碑铭四周有线刻卷草纹。<sup>[14][15]864[16]106、139</sup>一通是藏张掖文化馆的《黑河建桥敕碑》。该碑立于西夏仁宗乾祐七年（1176），碑首平顶刹去两角，无碑额，碑高1.15米、宽0.70米。碑文汉藏合璧，每面碑铭上边线刻飞天二身，周边莲花牵枝图案。碑座为两层仰覆莲式。另两件与西夏有关的墓碑，即两通府州折氏碑。折氏据文献记载亦属党项羌族，自唐代以来世居麟、府之地。一通是《折继闵神道碑》，碑高2.22米、宽1.07米、厚0.27米，碑首平顶，碑底两端有凸出的榫头。另一通是《折克行神道碑》，碑高3.26米、宽1.40米、厚0.45米。这两通折氏碑的碑棱刹角，碑铭四周有牡丹纹或蔓草纹饰边框，碑身两侧亦刻饰牡丹蔓草花纹。<sup>[17]</sup>元代西夏遗民碑刻中，甘肃酒泉发现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碑》，立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1362），碑身高2.36米、宽0.91米、厚0.30米，碑首平顶刹去两角。碑阳汉文，碑阴回鹘文。是碑记述自西夏灭亡至元末130余年间，唐兀氏举立沙家族6代13人的官职世袭及其活动。<sup>[18]</sup>河南濮阳《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该碑立于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碑呈方柱体，盪顶式碑首，莲花座碑座，通高3.04米、边长0.66米，有篆额，魏体碑文，四面镌文。碑文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初祖唐兀台、二祖闾马、三祖达海的业绩及四世至六世的谱系。<sup>[19]</sup>河北保定《大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立于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碑为方柱形，高3.54米，碑额雕龙，四面镌刻文字。此碑为元惠宗时集贤侍读学士纳怀为其曾祖父老索立的神道碑。老索，本西夏唐兀氏。碑文记载了老索家族从太祖成吉思汗到顺帝时，4代人100多年的主要经历。<sup>[20]170</sup>

按以上的碑铭举例，西夏及其遗民墓碑的常见形制有长方体及方柱体，碑身高2米以上，一般3米左右，最高达3.5米；碑宽1米左右，最宽1.4米；厚0.3米~0.6米余。碑首有圆首、平顶刹角（圭首）及盪顶三种，碑额有篆额与雕龙之别，有些碑身铭刻两种文字，碑铭四周刻饰花纹边框等。

在西夏陵区发掘的碑亭遗址中，原编M108号陪葬墓一座碑亭、7号陵西碑亭、3号陵西碑亭出土的残碑材料，为探索复原西夏陵区的墓碑形制情况提供了一些线索。

原编M108号陪葬墓汉字、西夏文残碑块共计349块，均出土于同一座碑亭。碑块皆灰砂岩石质。从碑文内容看，夏、汉文残碑文句相似，内容相同。如，汉文残碑碑题为“尚

父太师”、“知（枢）密院事”、“梁国正献王神道碑”；西夏文残碑碑题为“（梁）国正献王之神道碑”，西夏文残碑中还见“太师尚书令梁国公嵬名讳安惠”、“知（枢）密院事六部”等字句。又如，汉文残碑有“太后亲征怀德军”文句；西夏文残碑则有“皇太后□已出/怀德军胜能”等文句。再如，汉文有“俄顷清风徐来”，西夏文则有“由此清风（徐）动醉人”的词句等。残碑块中大约有十分之一带有边缘花纹。这些带花纹的残碑块提供两方面信息：一是碑铭周边刻饰忍冬纹花纹边框，边框宽3.5厘米~4厘米；二是碑身四棱刹角，刹角宽3.2厘米，刹角处及碑侧均为素面。据以上碑文内容、结合碑缘花纹、镌刻手法以及字体风格、碑块石质分析，原编M108号陪葬墓碑亭出土的所有残碑应该属同一方墓碑，墓碑阴阳两面刻字，碑文夏汉合璧。西夏文为楷书，字体方正、娟秀，每字边长约2厘米。汉文篆、楷两种书体：篆体，大字，每字边长6厘米，可能为碑额；楷体，小字，每字边长2.1厘米，字体匀称、俊秀。墓碑阴阳两面首行均为碑题。汉文一面末四行为碑文赞语。左面碑侧下部刻字数行，似为工匠题名。碑首可能为平顶，首部碑面中间是篆字额题。推测墓碑整体与府谷出土的折氏碑形制相近。

7号陵西碑亭出土的1265块西夏文残碑，带碑缘花纹的197块（东碑亭出土汉文碑块中带碑缘花纹的63块），这些碑缘花纹残块分属碑首、碑额、碑两侧、碑底部位。从两碑亭出土残碑可知，每座碑亭残碑块上的铭文同属一种字体，从字体风格、镌刻手法及碑缘花纹的图案分析，每座碑亭只有一方墓碑，即东碑亭为一通汉文碑，西碑亭为一通西夏文碑。西碑亭墓碑碑首残块中有一碑角残块形状很特殊，该残块存有三个面，上面、侧面和正面。三面都刻有花纹，其中上面与侧面之间夹角约为 $120^{\circ}$ ，侧面与正面成 $90^{\circ}$ 直角，三个面相交连的转角处，均刹去棱角，刹角处饰忍冬纹，刹角宽度和花纹饰与碑棱刹角处相同；另有一碑首残块，碑面有一锐角形花纹边框，夹角约 $30^{\circ}$ ，边框为素缘宽边，边框内刻饰蔓草纹。从这两种残块分析，7号陵西夏文墓碑似为盂形顶，那件 $120^{\circ}$ 夹角的残块或为碑首的一角； $30^{\circ}$ 夹角的残块或为碑身与碑首的交界处。碑额呈正方形，额面篆体阴刻，共4行，每行4字，四周绕以线刻边框，边长40厘米，边框上边有忍冬纹花纹带，纹带宽9厘米；下边为龙纹，与碑缘花纹相同。墓碑四棱刹角，刹角宽3.5厘米~4厘米，刻饰忍冬纹。碑侧面刻饰大型云龙纹。碑身平底，碑厚不少于30厘米。碑身两面西夏文楷书阴刻，字体内镏金。碑铭四周有宽10厘米~11厘米的花纹边框，边框内为以蔓草、云纹衬底的龙纹图案，龙纹弯曲腾跃成“S”形，蔓草翻卷，置于两龙之间，一龙一草为一组，一组图案长约35厘米。通过对碑身边框纹饰残块拼对、分析，可得知碑铭四周的边框花纹呈上下、左右对称的形式。在西夏文残碑中，有一块纹饰特殊，其花纹以两蔓草纹相连，两草翻卷方向相对，草间有一团花纹（似火焰纹）。这块残碑可能处于墓碑中界的位置。再结合其他碑底残块，特别是碑底两角残块上龙纹的方向分析，墓碑碑底（及上边）花纹应为：以中线为界，一草一龙顺序排列，两边龙纹龙首相向而对。在发现的所有碑底残块中，龙首方向一致的至少有三组，如果这三组花纹分别属于碑阳碑阴两面，那么墓碑上下的横向花纹边框内至少应有四组一草一龙花纹——两组龙首左向，两组龙首右向。若加上墓碑两边纵向花纹边框宽度，碑身宽度至少在1.6米左右。从一些碑侧残块可以知道，碑身左右两侧的花纹也为一龙一草顺向相间排列，龙纹方向一律是龙首向上，龙背向外。墓碑纵向花纹的组数缀合有连续的四龙四草，龙纹长26厘米，草纹长11厘米，四组龙草纹长度加上碑额部分和横向花纹边框的宽度，碑高应至少在2米以上。这仅是对墓碑高度的最保守

推论。<sup>[2]121-128</sup>

3号陵西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700余块。经拼缀有7块碑首残块、两块碑底残块。碑首残块表明墓碑顶部呈弧形、顶面磨光。碑额减地平刻腾龙云朵纹带。碑额中部的纹带宽15厘米~16厘米,纹带由中部向两侧渐窄,即碑额的下轮廓线亦呈弧形。碑额下紧接墓碑铭文,碑文竖读,刻写铭文随纹带弧度渐小而行数上的字数递增。发现的碑底残块石料的颜色略有区别,一件呈青灰色,一件呈红灰色。碑底部平面留有平行线状凿痕,正面减地平刻S形卷草纹饰带,纹带宽15厘米。3号陵西碑亭的碑铭残块反映的基本信息有,碑亭中至少有两通墓碑;碑首笏头形;碑身铭文周边纹带的宽度也表明其墓碑的规格不逊于7号陵墓碑。

西夏陵区墓碑碑首存在几种形制,根据推测有平顶、盂形顶、笏头形顶;碑座不是唐宋墓碑的主流座式龟趺座,而是立方体式的雕像力士座,这是西夏文化中颇具民族特色的内容;墓碑的尺寸,帝陵碑宽度在1.6米左右,高度若按《营造法式》中所记碑宽、高之比例结合传世的一些西夏碑刻材料推之应在3.5米左右,碑厚0.4米左右。不应回避与否认,依现已发掘出土的西夏残碑,以现有的研究手段、认知水平,来操作复原西夏陵区墓碑规制,毕竟与历史的真实尚有一定距离。这个谜案曾作为西夏“学术操练”的一个典型课题。

注释:

- ① 3号陵东碑亭台基台面铺地砖下的柱洞,当时发掘清理时还没有发现。2001年对3号陵园土遗址进行加固保护,为展示其东、西两座碑亭基址全貌,重又揭去东碑亭遗址上的回填土,在清理打扫遗址台基台面过程中,时逢天降小雨,原有柱洞的填土受潮后颜色泛深,与台基夯土面易区分,在基址“亭室”中,发现柱洞10个。

参考文献:

- [1]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 [J]. 文物, 1978 (8).
- [2] 许成, 杜玉冰. 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5.
- [3] 李范文. 二号陵残碑的碑额 [J]. 文物, 1978 (8).
- [4]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银川西夏陵区三号陵园东碑亭遗址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1993 (2).
- [5] 余军. 西夏陵区3号陵园西碑亭遗址 [M]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9).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 [6]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西夏陵区108号墓发掘简报 [J]. 文物, 1978 (8).
- [7]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西夏陵区101号墓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1983 (5).
- [8]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闽宁村西夏墓地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 [9] 李范文. 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 [10] 韩兆民, 李志清. 关于西夏八号陵墓主人问题的商榷 [M] //考古学集刊 (第五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11] 余军. 关于西夏陵区3号陵园西碑亭遗址的几个问题 [J]. 宁夏社会科学, 2000 (5).
- [12] 韩小忙. 西夏王陵 [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 [13] 史金波, 白滨, 吴峰云, 编著. 西夏文物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 [14] 罗福颐. 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 [J]. 文物, 1961 (4, 5).
- [15] 陆增祥. 八琼室金石补正: 卷一百二十二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 [16] 陈炳应. 西夏文物研究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 [17] 戴应新. 折氏家族史略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89.
- [18] 史金波, 白滨.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碑》考释 [J]. 民族研究, 1979 (1).
- [19] 穆朝庆, 任崇岳. 《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唐兀公碑铭》笺注 [J]. 宁夏社会科学, 1987 (1).
- [20] 白滨. 寻找被遗忘的王朝 [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魏淑霞)